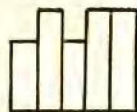


中国的工业化 与外国直接投资

樊勇明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外向型经济丛书

C.D. 75/15

外向型经济丛书

中国的工业化与外国直接投资

樊勇明 著



中财 B0032831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书章

总号 602006 402001

书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2 号

160504

责任编辑 陈俊言

封面设计 邹越非

中国的工业化与外国直接投资

樊勇明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50000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80515-757-X/F·222

定价: 3.50 元

前 言

吸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政策、大动作。十多年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尽管还存在种种问题,但是,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工作正逐步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外商直接投资已在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经过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考验,在顺利完成治理整顿之后,中国将于1992年进入进一步扩大开放,加深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此新形势下,系统总结十多年来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教训,研究外商投资企业的运行机制,预测九十年代以至更长时期内中国吸收利用外资的前景是一项十分紧迫的课题。从微观上看,开展这一研究将为搞好大中型国营企业提供借鉴和启发,从宏观上看,这将为进一步完善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相互补充,寻求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供新思路、新经验。本着上述想法,笔者在学界前辈的指导下,经过大量的调查和比较,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本书在叙述和分析上采取了纵横结合的办法。全书七章中的前两章,着重是纵向叙述,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对中国吸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作了历史回顾和现状描述。任何事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不断完善而来的。即令在闭关自守的“文革”前三十年,中国也对利用外资的可能性作了在当时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大胆探索。但只有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以后,

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才能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现实。囿于篇幅所限,在第一、二两章中没有对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作深入的理论探索,而是着重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战略及其同吸收利用外资的相互关系。笔者意识到,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题目,需要从历史的教训、现实的需要和国外的成功经验等几个方面作论证,比较和分析。如果读者能从这两章中对工业化必须走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道路,必须实行既坚持自力更生又要积极引进利用国外先进技术资金的两条腿走路方针有所了解的话,则是笔者的心愿之所在了。

本书的第三、四、五、六章是横断面的剖析,分别就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结构及其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扩大出口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与促进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机制作了分析。在这四章中笔者着重采用大量的统计资料 and 具体案例,力求用事实说明问题。马克思有句名言,大意是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物质的东西还需物质去打倒它。同样,在判断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体体现的外商投资能否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国经济中生存发展,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壮大起积极作用时,必须头脑冷静,实事求是,多方论证。笔者曾在国外的学术研究机构里进修和工作过,在本书写作中也同国外的一些学者多次切磋和交换意见,常常有种感觉,即一些国内学者在著书立说时,重理论思考而轻实证研究,有人过于在“做文章”上下功夫。因此,在本书写作中,很想引进些国外学术界注重实证的研究方法。这一尝试是否成功还很难说,但是笔者真诚地希望读者从大量的数据和众多案例中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功过是非有所了解。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外商投资结构基本上是合理的,生产性项目和高新技术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以五大经济特区和十四个开放城市为骨干的中国沿海地区在吸收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上有着无

可替代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目前以港澳台同胞和华人华侨为主的投资来源才会逐步改变,要让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全球性跨国公司和大企业将来成为中国吸收外资的主要来源还需我们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至于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何,答案也是明确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消极影响亦不可忽视。现在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值已接近中国工业产值的10%,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中,外商投资企业是促使经济全面回升的重要推动力。在九十年代中国实施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时,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吸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是必不可少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负面效果的分析集中到一点,那就是,中国在利用外资、外资也在利用中国。我们既要有让外商在中国赚钱发财的胆略,也要不断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外资政策,完善管理,不让不法外商借投资为名行占领市场,推销产品之实,大肆偷逃税利,坑害中方企业。

大量事实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与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方针相呼应,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主要有两种类型,即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型企业和以国产化为主要目的的技术先进型企业。这两类企业的不断增加,一方面推动着原有的工业结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为中国经济参与亚太地区产业分工,走向世界开辟了现实而广阔的途径。这样,就从根本上打破了“文革”前三十年中国技术引进中的引进——停滞——再引进——再停滞的怪圈,为中国今后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技术差距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这一章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所起作用的论述中,因缺乏全国性的资料与统计,只能以上海为例来加以说明,此处难免以偏概全,敬请读者谅解。

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在中国生存发展,也即其生产经营机制问题,是研究中国吸收利用外资课题中最发人深省的。一个资本主义的“细胞”为什么能在社会主义机体上成长发育,并能创造出比国营企业高得多的经济效益。除了文中详作分析的自主经营权,平等竞争机制和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以外,一个正确而切合实际的外资政策是必不可少的。进而言之,十多年来一系列外资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实施源于中国各级政府和决策者对国情与世界局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这里,不能不强调,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人的思想和观念的转变是极其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断解放思想,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历史任务。

在第五章第三节关于国产化及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的论述中,因资料缺乏,在征得同意之后,基本借用了上海计划经济研究所沈逸珍女士的文稿,在第六章第二节中借用了该所研究人员浦仲文先生文稿的一部分,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笔者长期从事国际经济,特别是日本经济的研究。因此把最后一章留给了自己的长期研究对象日本,就日本对华经济战略和对华投资作了些分析和论述,这对于读者来说可能是十分唐突,且同全书体例也不太协调,但以一个日本问题研究者来说则是完成了一桩心愿。在本书即将交付出版社时,我的一位日本友人,更确切地说是我在日本学习工作时的导师之一,日本知名学者渡边利夫把本书的稿子介绍给日本的学术出版社之一文真堂出日文版时,写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这一章就显得更为必要了。从过去十多年的历史来看,尽管中国吸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是成功的,但在吸收利用一衣带水的日本资金和技术上还很不够。究其原因,既有日本对华经济战略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也有中国未能正确估计自身优势和缺陷之故。日本领导集团对华经济战略的基点是既要中国有一定的强大,又不愿让中国赶上或超过日本。换言之,

日本既有向中国提供资金技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良好愿望,又有怕中国强大起来对己不利的担忧。从中国来说,光强调地大物博和劳动力便宜是不可能争取到大量日本投资的。九十年代是世界资金短缺的时代,而号称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仍然资金充裕,加之想在亚太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愿望,因此其对华投资的潜力是不可低估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如何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创造一个对日本投资者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无论从形成有利于四化建设的国际环境来说,还是从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来看,争取和利用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扩大中日经济合作是九十年代中国对外政治经济关系中极其重要的课题。

作为一个国际问题研究人员,本人在长期的研究实践和对外学术交流中深切地感到,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研究国际问题要为国内政治经济建设服务。研究外国问题,必须从中国出发再回到中国来。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就提出师夷制夷的口号,想从西方学习中找到富国强兵的真理。“五·四运动”后鲁迅先生又倡导从国外偷来火种,点燃中国的光明未来。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现在,凡愿为振兴中华出力的知识分子,更要把国外点点滴滴可取之处介绍到中国来,使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正是出于这一想法,笔者虽然对中国经济不熟悉,但在各位前辈和学友的指点帮助下,完成了此书的写作。愿拙著能对各位读者了解中国吸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问题有所了解,有所启发。

九十年代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时代。事实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有些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拿过来用。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预料,在九十年代,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将有飞跃的发展,这不仅会更快地促进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和经济科技实力的增强,而且还

会带来广泛的社会变革和深刻的观念转变。笔者期待着有更多的人投身到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中来。

在搁笔之际，再次向为本书提供文稿的上海市计划经济研究所的沈逸珍女士、浦仲文先生表示感谢。

向在本书写作中为笔者提供种种帮助和支持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同事冒荫寰、陈鸿斌、朱心坤和吕纪庆等表示感谢。向积极支持本书出版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陈俊言先生表示感谢。

樊勇明

一九九一年岁末

中国的工业化与外国直接投资

前 言	(1)
第一章 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工业化战略	(1)
一、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工业化和外资引进	(2)
二、封闭式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终结	(5)
三、新复线成长工业化战略的形成	(11)
第二章 中国外资政策特点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概况	(18)
一、中国外资政策概述	(18)
二、外商对华投资起步阶段(1979—1984 年)	(21)
三、外商对华投资调整阶段(1985—1986 年)	(26)
四、外商对华投资发展阶段(1987—1989年 6 月)	(31)
五、外商对华投资曲折阶段(1989 年 6 月—1991 年 6 月)	(34)
第三章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结构分析	(44)
一、债务化的外资宏观构成	(44)
二、以台港澳同胞和华人华侨为主的投资来源	(52)
三、偏重第三产业的产业分布	(61)
四、以沿海三大投资圈为主的地域分布	(68)
第四章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82)
一、普遍优于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	(82)
二、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	(93)
三、对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贡献	(97)
四、不可忽视的消极因素	(106)

第五章 对出口增长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 (111)

 一、出口创汇的生力军..... (111)

 二、技术引进机制的根本变革..... (118)

 三、国产化及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推动..... (127)

 案例研究：上海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 (136)

第六章 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及其示范效应..... (145)

 一、自主经营..... (145)

 二、企业内公平竞争机制..... (151)

 三、企业内中外文化的差异冲突与相互融合..... (158)

 四、外部经营环境的缺陷及其影响..... (166)

第七章 从日本对华投资看中国吸收外资的前景..... (173)

 一、日本对华投资的三大不平衡..... (173)

 二、日本对华投资的基本特征..... (179)

 三、从期望过高到互不信任..... (185)

 四、外商对中国投资的展望..... (188)

第一章 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工业化战略

实现工业化,谋求繁荣富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众多中国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主张从西方工业文明中借入火种,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洋务运动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孙中山先生在其宏大的《实业计划》中设想“倘吾国人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①。蒋介石主政大陆时期,也在三十年代由国家资源委员会制订了利用外资发展工业的计划。不幸的是,这些口号、设想和计划均因外来侵略,政局动乱或自身腐败而付之东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翻开了中国工业化历史新的一页。当1952年大规模国内战争刚刚基本平息,毛泽东主席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今后的总任务和总方针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其后,即使历经坎坷,中国从未放弃这一目标。1975年,文化大革命尚在进行之中,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又一次提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成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强国的宏伟目标。十年动乱之后,久锁的国门重新打开。世界经济的巨大发展,特别是西方国家高度的物质文明又一次震撼了每个中国人的心灵。于是,如何利用国际上充裕的资金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性课题,又一次摆到了我们面前。

为了给总结分析自1979年以来中国吸收利用外国资本和先

进技术，探索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一个广泛的背景，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中国工业化战略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

一、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 工业化和外资引进

历史已经证明，1979年以前的三十年的工业化是在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方针下开展的。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断绝了同国际社会的一切经济往来。当时的对外贸易尽管数额不大，但仍作为一种拾遗补阙的手段而逐步开展并有缓慢发展。除了外贸以外，还在各个时期，出于不同需要，中国也吸收利用了为数不多的外国贷款，建立过个别合资企业和利用延期付款等方式引进了一定数量的设备和技术。其情况如下：

建国之初，中国主要从苏联东欧引进资金和技术，为工业化的起步奠定了基础。1950年2月，苏联向中国提供年利率为3%的3亿美元贷款，用于偿付苏联给中国的建设物资。1955年，苏联再次向中国提供年利率为1—2%的50多亿旧卢布（约合24亿美元）的多用途贷款。到1964年，比协议规定提前一年，中国全部还清贷款本息。利用这两批贷款，中国在五十年代先后从苏联引进一大批成套设备，建立了冶金、机械、汽车、石油、煤炭、电力、电讯等149个重点基础工业项目。同时，中国还从东欧国家引进了些成套设备。在五十年代初，中国还同苏联东欧国家开办过合资企业^②。1950—1951年，与苏联合办了中苏新疆石油股份公司、中苏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中苏民航公司和中苏大连造船公司，股份均是双方各占50%，合营期十至三十年。但是1954年苏方将其股份转为贷款，从而结束了合营。但是，当时中国与波兰合资建立的中波轮船公司，一直联合经营至今^③。

五十年代从苏联东欧引进的资金技术对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使中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期间的机器设备自给率达到了80%,而且还生产出本国历史上从未生产过的飞机、汽车、拖拉机等。

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引进资金技术的重点逐渐转向西方国家,方式主要是利用出口信贷和延期付款来引进成套设备。1963—1968年,为了对冶金、石油化工、机械、电子、轻工业等行业部门进行技术改造和填补生产技术空白,中国先后从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引进技术和设备80多项,其中成套设备52多项,价值3亿多美元。据丸山伸郎在《中国工业化和产业技术进步》一书的资料,当时中国引进成套设备的范围很广泛,从生产资料到消费品生产都有,其中主要的有从奥地利引进的纯氧顶吹转炉炼钢设备;从日本引进的日产30吨的维尼龙生产设备;从联邦德国引进的原油裂解装置;从英国引进的腈纶生产设备和年产10万吨的合成胺生产设备等。这些重大技术装备占了这一时期引进设备总金额的55%以上。然而,受科学技术基础薄弱和资金不足的限制,这些引进项目进展不太顺利。加之,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所卷起的排外仇外情绪,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同引进工程的接触被限制在最小范围内,连可行性研究和必要的业务性交流也无法开展,甚至一些来自英国和联邦德国的技术人员被无理赶走,从而使相当数量的引进项目失败,即使勉强建成的项目,如兰州石油化学总厂的聚丙烯项目不仅工期大幅度延迟,而且投产后设备故障不断。

七十年代初,随着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与美、日、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中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日益好转。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之中,闭关锁国的错误方针仍占主要指导地位。因此,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的工作仍然局限于利用出口信贷和延期付款方式引进成套设备,只不过规模上稍有

表 1-1 1950—1979 年中国技术引进的实绩

	第 1 期 1950— 1959年	第 2 期 1963— 1966年	第 3 期 1973— 1977年	第 4 期 1978— 1979年	第 1—4 期 合 计	第 5 期 1980— 1985年
引进总额 (亿美元)	27	3.02	35	79.9	144.9	69.2
其中成套设备额(%)	24(%)	2.8 (90%)	31.5(90%)	76.1 (95%)	134.4(93%)	(65.6%)
项目数 (件)	233	80余	20余	145		
产业分布(%)						
能 源	36.8	10.8	18.8	24.7	25.2	29.2
石 油	2.9	5.8	2.0	1.7	2.1	4.9
石 炭	4.5	—	3.0	11.5	8.0	4.7
电 力	29.4	5.0	13.8	11.5	15.1	19.6
钢铁(有色金属)	22.9	31.7	20.1	26.1	24.1	25.5
化 学	5.6	28.1	26.2	29.1	24.0	2.5
轻 工 业	4.3	16.7	24.5	9.2	12.1	9.3
纤 维	1.6	11.7	23.4	7.5	10.3	4.8
机械工业	11.3	10.9	2.1	1.1	3.7	21.4
军事工业	11.8	—	5.6	6.3	7.0	0.2
建筑材料工业	2.6	—	0.2	1.6	1.5	2.2
运 输	0.5	—	0.9	0.5	0.6	0.2
农业,林业,水利	0.7	—	—	0.1	0.2	0.2
其 它	3.5	1.8	0.6	1.3	1.6	9.9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出处:《中国的工业化和产业技术进步》丸山伸郎著,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1988年。

扩大。从 1973 年到 1977 年同国外签订引进技术设备合同 220 多项,成交额 30 亿美元,其中有 26 项大型成套设备,主要的有采用

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武汉 1.7 M 冷轧生产线一条、年产 30 万吨合成胶设备 13 套和年产 300 万吨的热轧设备等。

“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后，中国百废待兴，1977—1978 年又出现“洋跃进”，一年内就签订引进技术设备合同 73 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所需金额占总金额的 70% 以上。外汇需要量大大超过国家可承受的能力，致使一些项目很快被迫下马或调整压缩规模。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即从 1950—1979 年之间，中国共利用外资 144.9 亿美元，引进了 670 多项技术和设备（参见表 1-1）。但是，因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资金和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对中国工业化的促进作用有限。

二、封闭式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终结

如对 1950—1979 年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的实绩作一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前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是典型的封闭式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第一，引进利用外资手段主要靠对方提供的出口信贷和延期付款。在总额 144.9 亿美元引进利用资金中，除五十年代苏联两笔贷款约 27 亿美元之外，其余几乎全是对方国家提供的出口信贷和延期付款。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只有中波轮船公司等极个别现象，不仅金额微乎其微，而且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才设立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出口信贷和延期付款是一种商业借款，利率高、偿还期短。由于中国的对外贸易不发达，外汇支付能力有限，因此，靠上述办法来利用外资只能局限于小规模范围内，一旦工业化进程全面开展的话，马上就难以为继。1977—1978 年的“洋跃进”除了决策上的错误之外，同时也证明了过去三十年有限地利用外资模式是无法适应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需要的。

第二,引进技术设备中,绝大部分是硬件。软件引进直到1975年才开始,至1978年底才仅有30项,进入八十年代后软件引进才大量增加,每年引进软件的项目数达200—300项,占技术引进总金额的一半左右。日本在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大量引进技术设备,但在软硬件比例上,软件占80%以上。过去中国技术引进中硬件占主导地位的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国内科学技术力量严重不足和西方各国对华敌视政策所致;另一方面,中国在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中只着眼于植入现成的生产力,或只重视物化了的技术。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的引进同中国整个技术产业结构调整缺乏内在的联系,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促进不大。因此其引进效果是十分有限,不会或较少出现一般意义上的前后方关联效果和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或者说外来资金和技术与本国原有的科学技术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处于割裂和相互排斥之中,陷入了引进——停滞——引进——再停滞的恶性循环之中。以石油化工为例,中国在六十年代曾大规模引进过合成氨,聚乙烯等化肥、化纤大型成套设备,尔后又在七十年代再次大规模引进同样设备。这种重复引进的做法不仅在石油化工,而且在钢铁、机械等行业也十分普遍。再如,对引进技术设备的消化吸收,日本与中国几乎在同一时期从奥地利引进纯氧顶吹技术与设备,但日本很快消化吸收并加以改进后再出口这项技术,而中国引进后则只能停留在原有水平,其它的项目也是如此,有些甚至连原有设计水平也未达到。

第三,引进的重点在产业的上游和后方,即以钢铁、石油化工、机械等原材料工业和装备性工业部门为主。据表1-1材料分析,1950—1979年之间,在中国耗资144.9亿美元引进的670项技术设备中,相对接近民用消费的外资(主要是纤维)只占引进总额的10.3%,其余90%均是生产资料。能源开发与建设占25.2%;制造业占48.8%,其中钢铁占24.1%;化工,主要是石油化工占24%;机